

# 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与吴晗同志商榷

向阳生

最近许多报纸正在开展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我看过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之后，重新翻阅了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同志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七稿、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改定的剧本，同时参看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个期间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晚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所刊登的有关海瑞的其他文章和几种剧本，加以比较，反复探索吴晗同志研究海瑞和创作《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指导思想究竟是什么？

在《海瑞罢官》这个剧本的前言中，作者已经基本上把他的指导思想作了概括的说明。他说：“海瑞的地位在历史上是应该肯定的，他的一些好的品德，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同样在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的文章中，吴晗同志都曾极力歌颂和肯定海瑞一生的事迹，盛赞海瑞的道德品质。他认为，“这些品质，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学习和提倡的。而且只有在社会主义时代，这些品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扬，虽然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

我对于吴晗同志的全部作品还来不及进行更多的研究，但是，吴晗同志要求我们今天生活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去学习、提倡和充分发扬距今四百年前的明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所谓“清官”海瑞的道德品质，这却使我感到十分难以理解。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

## （一）什么是《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

打开这个剧本，人们不难发现，吴晗同志企图通过他所加工塑造的舞台上的历史人物和故事情节，尽力宣扬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一整套封建的道德，要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去提倡，并且加以充分发扬。《海瑞罢官》一剧描写了海瑞如何“除霸”、“退田”、“平冤狱”等等情节。这些不但涉及了许多史实的考证问题，而且有一个同现实的关系，即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序言中还说，他“在动笔之前，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不写海瑞的一生，只写海瑞斗争生活中的一段。……第二，已往有过的剧本不再重写”。那末，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与其以往的同类剧本，如《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究竟有什么不同？其他有关的各家评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又如何解决？这些我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加以讨论。现在首先要讨论的是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到底是什么？

我一直没有看过这出戏，我以为吴晗同志亲自动手，编写一部新的历史剧，总会有新思想、新内容吧。可是，现在看了剧本，的确感到失望。原来吴晗同志对于他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海瑞，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是通过剧中人物向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极力宣扬吴晗同志自己所提倡的一整套封建道德观念。

你看，当着海瑞的夫人劝他要谨慎“三思”的时候，海瑞的回答是：“夫人，你说到哪

里去了?那徐阶纵子行凶,我海瑞如顾私恩而忘国法,何以对慈母,对皇上,对百姓!”在这里,显然“对慈母”就是说的“孝”,“对皇上”就是说的“忠”,“对百姓”就是说的“义”和“仁”,这里,仅仅他要求夫人守“节”这一条没有机会提到罢了。海瑞在另一个地方还说:“大丈夫顶天立地,岂可怕杀身之祸,便徇情枉法,做个没廉鲜耻之人!”这里又强调了封建统治阶级道德中的所谓“廉”、“耻”的观念。至于海瑞的母亲及其他正面的人物说什么“读圣贤书,行圣贤事”、“希圣希贤”等等词句还多得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着徐阶向海瑞说情的时候,海瑞唱道:“海瑞忠君姓名香,徐瑛强暴犯王章”。“太师不必多言讲,海瑞精忠对圣皇”。你看他口口声声总离不开“忠君”的思想,即便当他打算为“百姓”做点“好事”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的还是为了“忠君”,为了巩固明朝的封建统治。所以剧中的海瑞在道白中说:“江南庶政,除霸、清丈、条鞭、治水、退田五件大事,必须早日办好,多为百万生民办一点好事,也就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由此不难看出,海瑞是明朝封建皇室的“忠臣”,他为“百万生民办点好事”的目的,就在于“为皇上减少一分隐忧”。这就表明,吴晗同志通过剧中主人翁海瑞所宣扬的中心思想,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节、义等一整套道德观念。吴晗同志把海瑞这个封建皇家的“忠臣”,加上了“人民救星”的称号,硬要人民相信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是可以继承的。

从这一方面来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与过去许多关于海瑞的旧剧、唱本简直没有多大的差别。

旧戏《大红袍》中的海瑞,岂不是也在大唱什么“为官忠良”“报答皇朝”吗?一九五九年后新编上演的《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剧本,同样离不开“君臣、父子、礼义”和“忠孝”、“纲常”等封建道德观念;离不开“食王爵禄,当报王恩”这一类唱词。我不了解,为什么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也摆脱不了旧戏的这一套陈词滥调?

吴晗同志历来主张研究历史要古为今用,写剧本更是为了教育今人的。他在《论海瑞》中说:“这样的历史人物,从今天来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该不该肯定,该不该赞颂?答案是应该肯定,应该歌颂。”在剧本的“序”里,吴晗同志叙述他自己一再重写这个剧本的经过,说在一年间改写了七次,每重写一次都要用两三天的工夫,表示“实在吃力”。他并且说:“敢想,敢说,敢做,是大跃进以来的新风格。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古人有抛砖引玉的成语,那就让这个本子当做一块砖,引起历史学界朋友们的兴趣,大家来写点新历史剧吧!”显然,吴晗同志自己的确认为他写的是“新历史剧”,是给历史学界的朋友们做出了一个榜样,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家照着他的样子去做。

我认为吴晗同志这样热心地编写“新历史剧”来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他有一个理论,即“道德继承论”。这个理论曾经是他所作的许多文章的中心思想,当然也是他创作《海瑞罢官》一剧的思想基础。

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的观点,主要发表在《说道德》、《再说道德》和《三说道德》的文章中。前两篇文章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前线》第十期和第十六期的“三家村札记”栏内,后来收进他的《学习集》中。《三说道德》发表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此外,他在一九六二年第七期《新闻业务》上发表了《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在一九六二年第三期《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

问题》，也都讲到了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观点。

究竟“道德继承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呢？吴晗同志在上述几篇文章中一再表明：“争论的焦点是在过去统治阶级的某些道德可不可以批判地继承这一问题上。”他自己肯定地回答说：“就统治阶级的道德论来说，其中有些人表现为忠，为义，为节，为勇敢，为勤劳，为朴素等等，尽管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有其剥削、压迫人民的一面，但就他们所表现的某一方面的道德面貌来说，看来还是不可以一笔抹杀的，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因此，他认为：“忠孝节义，礼义廉耻，这些道德观念是为过去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也可以把它改造，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他并且说：“不止是封建道德，就是资产阶级的道德，精打细算，多方赚钱，难道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企业的一条重要原则？”同时，他还认为：“民主、自由这两个概念，在资产阶级兴起初期，对反抗封建制度的束缚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自从有了无产阶级之后，有了马列主义之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民主和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下来呢？”他的答案是：可以叫做批判地继承下来了。我不了解，吴晗同志竟然把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也都加以抹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现在看来，吴晗同志的道德继承论的观点，是经过了长期酝酿和思索，早已形成了的。当他一九五九年发表《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的文章、一九六〇年及一九六一年修改与出版《海瑞罢官》的剧本以后，经过了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几篇《说道德》文章的发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若干争论，吴晗同志的观点不但没有根本的改变，反而更加固定，更加坚持了。

鉴于这个具体情况，我想在讨论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问题的同时，似乎有必要就“道德继承论”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以便于真正实事求是地从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辨明吴晗同志思想的实质，提高整个思想界的水平。

## （二）“道德继承论”是根本错误的

也许吴晗同志要否认，说他没有主张“道德继承论”，他在文章中讲到这个问题的時候，虽然不是每一次，但是经常都加了一个限制词，用了“批判地继承”的字眼。

我看了吴晗同志的许多文章，应该承认，吴晗同志确实在不少地方采用了“批判地继承”这个术语。可是，即便是在这些地方，他实际上也没有做多少批判，而是着重讲了继承。事实上，吴晗同志对于象海瑞这样的统治阶级人物的所谓“优良品德”，根本没有进行什么批判。他只是一股劲地加以宣扬，要求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如果把《海瑞罢官》的剧本和吴晗同志《说道德》等文章加以对照，不难看出，作者的意思是要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等封建道德一古脑儿都继承下来。这难道不是把过去统治阶级的道德做了正面的肯定吗？又有什么批判之可言呢？由此可见，在吴晗同志的笔下，批判二字，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并不存在什么实际的意义。

吴晗同志提到，“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但是，我从吴晗同志所写的文章和剧本中，根本看不出他如何阐述和证明这个不同点。

请问吴晗同志，你一方面提倡人们要学习海瑞的道德品质，一方面空泛地指出要区

别不同的社会内容，那末，这究竟是要人们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呢？任何一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任何一个人的道德品质，都有一定的社会内容。在阶级社会中，这主要的就是它的阶级性。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品质，与海瑞的道德品质对比起来，从阶级内容来说，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今天我们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经济基础变了，从而决定了社会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在内，也不能不随之而变革。但是，吴晗同志对于今天革命的新道德的社会内容似乎视而不见，因此，他对于新旧道德不同的社会阶级内容，实际上并不加以区别，而是一再地赞颂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以致对于海瑞这个人物的道德品质，更加推崇备至，要求今天的人们去“学习”和“提倡”，“使之得到充分的发扬”。照这样去学习，结果不外两种：一是拜倒在四百年前的古人海瑞象前，学习他的一言一行，作为今人的楷模；一是抽去海瑞所代表的封建统治者道德的阶级内容，剩下一些抽象的所谓道德概念，实际上是没有东西可以继承。这显然不是吴晗同志的本意，他的真实意图还是要有继承的。因为照他的说法，如果不继承过去统治阶级的道德，就不可能产生我们今天的道德。

这是完全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道德，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虽然有它的某种相对独立性，但是归根到底，它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在每一个阶级社会中，都存在两个主要的互相对立的阶级。一方面是占有了大量生产资料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另一方面是完全丧失了或者只有很少生产资料的居于被统治地位的被剥削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有根本不同的道德观念，它们是阶级斗争在人们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反映，并且在阶级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这就是说，阶级社会的道德，除了统治阶级的道德以外，还有被统治阶级的道德。无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道德总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被统治阶级，一般地说，往往会受到统治阶级道德观念的影响，甚至受它的支配。但是，无论如何，统治阶级的道德和被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我们摒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事实完全证明，历来的统治阶级总是把他们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不分阶级的一切人们都应该遵守的至高无上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以便巩固他们的剥削统治，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革命。然而，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终于出现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按照列宁的原则，无产阶级对于过去统治阶级的道德，非加以摒弃不可。

吴晗同志的观点与此相反，他曾经非常肯定地说：“无产阶级若不善于吸取过去统治阶级某些优良的东西，甚至完全摒弃，那末，看来只有向古代的无产阶级继承，或者自己来凭空创造了。问题是在古代，无产阶级并不存在，自己凭空创造呢，也不大可能。”你看他的这一段话多么武断！事实何尝是这样的呢！

历史表明，无产阶级在旧社会里，作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与资产阶级一同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道德观念，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无产阶级还不可能完全摆脱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的影响。但是，当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无产阶级就完全有可能而且必须用彻底革命的观点，严肃地对待和清理过去文化遗产和被压

追群众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其中正面的好的经验，当然应该加以批判地吸取，使它们成为革命的财富；对于反面的错误的东西，也应该用某种方法加以适当的利用，当成反面的教材。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象吴晗同志那样，不要求革命的无产阶级揭露剥削阶级道德的腐朽性、欺骗性，反而要求他们继承过去剥削阶级的道德。吴晗同志的这种论点，显然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点，根本没有共同之处，因而他的立场也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教导我们，道德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在原始社会以后，出现了阶级社会，也就出现了剥削阶级的道德。这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的，“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一种堕落，从古昔氏族制度之纯朴的道德高峰的堕落。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狂暴的情欲，卑劣的吝啬，对共有财产之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可鄙的手段——偷窃、暴力、狡诈、背叛——毁伤了旧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以至把它引向崩溃。”从这以后，在漫长的阶级社会的各个时期，道德就成为阶级的道德，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阶级的道德。而剥削阶级的道德一直占据统治的地位，被剥削阶级的革命觉醒过程，也就是同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决裂的过程。无产阶级是历史上一切被剥削阶级所不能比拟的革命最彻底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无产阶级无论在取得政权以前，或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如果对于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思想不进行革命的批判和斗争，就不可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以及封建主义道德观念的影响。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不但要在经济战线上，而且要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坚决把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到底。这就是说，不但要解决社会经济基础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比其他问题更为复杂，要解决这些问题就特别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思想斗争。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同样明确地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各有不同：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的，被剥削者认为恶的，剥削者认为善的，离开阶级关系而来讨论人们的性善和性恶，自然闹不清楚。”在这一点上，吴晗同志和其他歌颂海瑞的同志也决不可能例外。当吴晗同志用心描写海瑞的形象，号召人们学习他的道德品质的时候，当他大讲“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道德问题的时候，他的思想无疑地是带着一定阶级的烙印的，他把道德问题的许多观点都弄得颠颠倒倒闹不清楚了。

《礼记》上明明写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这就证明封

封建统治阶级是把“礼”当做他们维护剥削制度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每一个道德概念，都具有它特定的社会内容，都是为了维护其剥削统治而制定的。

我不想引证许多古书，浪费笔墨纸张，但是，必须指出，吴晗同志认为过去统治阶级有一些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批判地继承”的道德范畴，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追根究底，无一不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它们产生的客观物质基础是封建制的私有经济。客观的历史表明，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着以家族为生产单位的宗法制，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存在着男性占支配地位的父权制，存在着嫡长子继承的世袭制。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所说的：“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于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产生了，并且反转来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

从实质上说，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切道德都是残酷剥削农民的道德。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礼”，其目的正如前面引述的《礼记》上的文字所表明的，主要是为了稳定整个封建社会的秩序；他们提倡“义”，就是为了使一切“臣仆”感恩图报，替他们去拚命，去牺牲；他们提倡“廉”，是要求“臣民”们勒紧裤腰带去喂饱地主老财和王侯贵族；至于所谓“廉洁奉公”的“清官”，他们的作用不外是维护和巩固剥削制度，不使过分的剥削和压迫招致群众的反抗，以便于欺骗群众（关于清官和脏官的问题，在这里不拟加以论述）。同样的道理，封建统治者要人们知“耻”，其目的无非是要老百姓饿死也不去夺取地主的粮食财物；他们提倡“忠”，则是为了维护腐败黑暗的君主制度，要求一切臣子死心塌地，俯首贴耳，甘当封建帝王的牛马奴隶；他们提倡“孝”，是要通过宗法家族的血缘关系来加强封建压迫，维护封建家族和皇室的统治；提倡“节”，不但是为了维护蹂躏女姓的夫权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使封建主的一切臣子和奴仆永远不背叛他们的主人。《论语·学而》中有一句话，赤裸裸地道出了统治阶级道德的作用和目的。孔子的门徒有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你看，这不是说得再清楚没有了吗？可见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有它明确的特定的阶级内容，都是为维护奴隶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残酷地奴役被压迫人民的一种思想武器。这些道德观念显然是反动的，应该坚决加以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对于其他一切反动思想，也必须加以彻底的批判，而决不能加以继承。

还有，吴晗同志认为：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无产阶级也可以“批判”地加以继承。这个说法也是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难道还不是为了无限制地压榨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吗？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残酷剥削劳动人民。他们越是精打细算，就越能多方赚钱，就越能够无限制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这是剥削者的原则和概念，同无产阶级的勤俭建国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又有什么相干，怎么可以混淆这两者的原则界限呢？

更可怪的是，吴晗同志竟然把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也列为无产阶级可以继承的东西。我们知道，民主和自由，不仅仅是道德的范畴，更重要的它是政治的范畴。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仅仅是在资产阶级的青年时代和壮年时代，当他们向封建制度斗争的时候，发生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是，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也没有给以平等的地位，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后来资产阶级取得和巩固了统治地位以

后，这些所谓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口号，很快就失去了进步作用，而变成了资产阶级无限制地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护身符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和自由，决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那样美妙。恰恰相反，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实行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只是允许资本家可以自由放肆地任意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可以自由地大鱼吃小鱼，吞并和掠夺社会财富。时至今日，事实更加证明，一个是资产阶级专政，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不你推翻我，要不我打倒你，这是你死我活的谁战胜谁的斗争，怎么能够丢掉它们的阶级实质而抽象地谈论继承性呢？吴晗同志难道还想继承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吗？

当然，统治阶级的道德作为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思想工具的同时，它又起着协调本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在他们内部，从封建的土地兼并到现代的资本垄断，互相倾轧，甚至互相残杀，愈演愈剧，史不绝书，这些都使他们不能不用虚伪的道德作为遮羞布。剥削者口头上讲的是一套，而做的又是另外一套。俗话说：“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就是对于剥削阶级最生动的写照。如果无视历史的实际，不认识剥削阶级道德的欺骗性和虚伪性，而侈谈剥削阶级的所谓“美德”，那就必然会导致极端错误的结论。

至于吴晗同志讲的勤劳、朴素等等，我认为，这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历来的剥削阶级都要求被剥削者勤劳、朴素，多生产财富，供给他们挥霍浪费。所谓“朱门酒肉臭”，是建立在“路有冻死骨”的基础上的。这同无产阶级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提倡艰苦朴素、勤俭办一切事业，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吴晗同志虽然一再说明，无产阶级所要继承的只是过去统治阶级道德的某些部分。但是，他所宣扬的这一部分恰恰是剥削阶级道德的主要内容。如礼义廉耻、忠孝节义、多方赚钱、民主自由等这些基本范畴，以及某些历史人物身上的所谓“美德”等等，这一切对于无产阶级说来，不但决不能加以继承，而且必须采取革命的态度，彻底加以清除。

### (三) 我们需要的是共产主义的新道德

今天，我国人民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指引下，正在进行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理想是在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完成无产阶级所必须担负的最崇高最艰巨的历史任务。

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且不断地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可以断定，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只能在革命斗争和集体劳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无产阶级不可能继承剥削阶级的道德，而是必须彻底批判它们，并且用共产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教育年青的一代，培养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

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普遍开展，这对于加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应该看到，我国人民的道德思想已经开始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新风貌出现于世界。事实已经推翻了吴晗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不继承

过去统治阶级的道德就不能产生自己的新道德的错误论断。

请看我们无数革命的先辈、革命的英雄和先烈，以及在全国各个战线上的其他许多先进生产者和模范人物，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们或者在革命的风暴中百炼成钢，或者在集体的队伍中长大成人，他们都经过了许多艰苦的自我教育，克服了旧道德的影响，形成了伟大的革命精神和道德品质。事实证明，新道德观念完全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在今天来说，我们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此相适应，作为我们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部分，包括道德在内，必然也要发生巨大的革命，破旧立新，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群众需要的。现在在全国各个战线上广大的革命干部和群众都在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加强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思想，已经从根本上奠定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以及其它原则性的规定，同样应该看做是共产主义道德的一些基本规范。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无产阶级的道德品质，首先应该表现在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基础上，然后才有可能做到全心全意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团结最大多数，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人；坚持民主集中制，遇事同群众商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勇于进行自我批评。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我们的道德之所以伟大，正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不是建筑的保护个人和少数剥削阶级者的利益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最后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脱离资本主义灾难，建设幸福美丽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利益的基础上，建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这就说明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最伟大的道德。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时代。这个大革命要把过去历史上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分别采取各种有效的步骤，进行彻底的革命。当然，这是极为艰巨的长期斗争的过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必须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正确地对待和清理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遗产。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早已指出：“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在区别的方法上，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

如何取精华而去糟粕，这是非常艰巨的工作，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分为二，进行彻底的革命的批判。不经过彻底的革命的批判，就不能区分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就无从决定取舍。目前的情况是，有一部分人思想上有片面性，有时采取过火的态度否定一切，或者反过来以接受遗产为借口，实际上连糟粕也被当做了精华。前者固然是我们应该加以纠正的，后者更应该加以反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不能不追溯到过去长期剥削制度的历史所造成的特殊条件。

一般地说，在阶级社会中，一个剥削阶级推翻了另一个剥削阶级而取得了统治地位，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会有一个新的变化，社会生产力也会有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这种变化毕竟只是新的剥削制度代替了旧的剥削制度，因而在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根本不变的基础上，社会的上层建筑有许多往往会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下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观念尤其容易被保留下来，并且有所发展。

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论，不管他们是属于贵族派或者平民派，他们主张对奴隶的残酷剥削是一致的。到了封建领主或者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他们对于农奴和手工业生产者的剥削方法，虽然比起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办法巧妙得多，他们仍旧把剥削制度当做永恒不变的。在西欧，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从奴隶制时期一直到中世纪封建制时期，始终被奉为经典，这决不是偶然的。同样，中国古代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岂不也是奴隶主和封建主所一致推崇的吗？

只有后来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情形稍稍有点不同。在西欧，当时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所加于人们的各种束缚，极力予以摧毁，在道德思想领域中曾经出现过“个性解放”的巨大浪潮。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采取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以等到资产阶级政权稳定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和自由贸易的发展，他们便逐渐放弃了他们在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主张，并向新兴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展开猛烈的进攻，以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至于在中国，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新兴的社会势力，外国资本主义已经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就使得中国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加于人民群众身上的一切枷锁，很久没有被打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现在的情况当然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但是，事实充分说明，在我国，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条件，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要想在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更具体地说，在道德观念上，进行一个彻底的革命，对过去各个历史时期的剥削阶级的道德思想进行一次总清算，还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相当复杂和艰苦的努力。

有一点可以肯定，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定会千方百计，特别是从思想上继续向我们夺取阵地，争夺青年一代，企图复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无产阶级的道德会自发地产生，自动地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那就未免太天真了。无产阶级要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就非得向资产阶级和历史上其他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不可。当着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了与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就完全有条件也必须大破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大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不破不立，敢破敢立，这是要有很大勇气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必须在大破大立的激烈斗争中才能发展，才能彻底清除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人们思想中的影响。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产生了共产主义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时候，……

就对任何一种道德，无论是禁欲主义道德或者享乐道德，宣判死刑。”

这就是说：第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观点，和其他革命观点一样，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斗争中产生的；第二，无产阶级的新道德观点和其他革命观点产生之后，就必然要对过去时代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任何一种旧道德宣判死刑。

吴晗同志大概是不愿意对旧道德宣判死刑的。所以他在《海瑞罢官》的剧本中，在几篇《说道德》的文章中，在若干次学术讲演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人们宣传过去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等道德观念，宣传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多方赚钱”和“民主”、“自由”等政治、经济和道德的观念，并且要把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这些不是非常可笑吗？

很明显，吴晗同志的道德观点在本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甚至于是封建主义的范畴；他的历史观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距甚远，只能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他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这就使他在政治思想和理论观点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原则错误。而且吴晗同志大量宣传他的道德观点的文章，都是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这个期间发表的。当时正是我国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受到鼓舞，纷纷出笼，刮了一阵妖风。经济战线上出现过“单干风”，政治战线上出现过“翻案风”，相应地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也出现了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当时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异常尖锐的。我不了解，为什么吴晗同志偏偏在这个时候一再宣传“道德继承论”，宣扬历史唯心主义，抹煞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原则区别。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说法去做，让我们的革命人民都拜倒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脚下，以他们为师，把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多方赚钱等等都学到手，那将会搞成什么样子呢？会不会从思想上瓦解革命人民，解除他们的思想武装呢？从这一方面来说，我认为大家应该看到宣扬“道德继承论”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认真展开讨论，肃清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希望通过讨论，彻底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道德观，使无产阶级的道德观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道德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应该允许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发表出来。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人人都要服从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我相信，只有认真展开讨论，才能使真理愈辩而愈明。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斗争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我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意见，只是关于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他的“道德继承论”的一部分而且是初步的看法，有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吴晗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也希望他继续写出文章，把自己的思想真正同大家见面，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则，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研究。如果这样做了，那末，我相信不管多么复杂的问题都是可以弄清楚的。